

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

——基于转移支付依赖的门槛效应分析*

韩一多 付文林

内容提要:收入分配不平等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本文实证考察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间纵向财政分配体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总体上未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转移支付依赖度较低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有助于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而转移支付依赖度超过某个阈值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反而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在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在专项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这意味着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应合理控制转移支付规模,进一步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关键词:垂直财政不对称 转移支付 收入不平等 面板门槛

作者简介:韩一多,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200082;

付文林(通讯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200082。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9)06-0040-15

一、引言

居民收入分配直接关系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构建了更为均衡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2008年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整体呈缩小态势,但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依然高达0.465。^①影响居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因素很多,自然地理条件、人力资本差异、地区商业传统、产权保护等都可能带来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安体富、蒋震,2012);税制结构、转移支付制度在矫正初次收入分配不平等方面也有很大影响(储德银等,2017)。

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中央转移支付,2017年中央对地方税收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的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16ZDA06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移支付制度与地方财政行为:激励效应与机制重构”(71373150);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垂直财政不对称、转移支付与收入不平等”(CXJJ-2018-370)。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编著《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返还和转移支付为 65218.1 亿元,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41.62%。^① 这种跨时期、跨地区的财政垂直不对称性,不仅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对可支配财力,而且会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激励结构,从而直接或者间接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衡(Bahl 和 Wallace,2010)。吕炜和王伟同(2008)的测算显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公共服务提供的现实数量远低于国际通常的经验值,这表明政府财政偏向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对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支出相对不足。Careaga 和 Weingast(2000)认为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的欠缺,会滋生在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中的寻租与腐败等行为,从而对收入再分配产生效率损失。

垂直财政不对称体制一般会从三种渠道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一是财政收入分配渠道。垂直财政不对称变化源自政府间税收收入、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改变,一些地区的财政相对获益,另一些地区的财政利益就会受损,这会反映在区域间、城乡间居民转移性收入差距的拉大上。财政吃紧的地区会更加偏向于保全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而越是贫困的农村地区却越得不到财政资金的支持(雷根强等,2015)。二是地方政府激励渠道。现行行政性、经济性分权体制下,资本的流动性要高于劳动力,地区间财政竞争使地方政府的收入分配格局偏向于资本要素、资本性支出项目,而忽视了民生性财政支出项目(陶然、刘明兴,2007)。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地方政府偏向于建设性财政支出在短期内不利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下降也会抑制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就业机会的创造(龚强等,2011),这些都可能加剧居民收入不平等。三是转移支付渠道。垂直财政不对称变化总是伴随着转移支付总量或结构的改变,通常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提高,有利于规避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效率损失(Beramendi,2003),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方式不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存在很大差异,如果中央政府主要增加具有均衡效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会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而如果主要是通过专项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生产性偏向和地方配套要求则会挤压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财力空间,进而加剧收入不平等。

收入分配调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政府间垂直财政关系改革的重要目标。之前的垂直财政不对称研究主要是关注地方财政均等化效果(李永友、张子楠,2017)及地方政府财政收支行为扭曲问题(Huang 和 Chen,2012;范子英、李欣,2014),但对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激励机制变化,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还是一个空白。考虑到垂直财政不对称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较为复杂,且会受到转移支付结构的很大影响,本文试图通过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实证考察近年来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文的创新可能有两点:第一,在对政府间纵向财政收支分配的整体特征进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垂直财政不对称变化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特征;第二,将地方转移支付依赖度作为门槛值,对垂直财政不对称作用于收入不平等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考察,发现转移支付依赖度过高,中央政府通过提高垂直财政不对称并不一定能够实现居民收入的均衡分配。

地区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始终是财政政策的落脚点,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当然可以全面评估我国近 20 年来均衡财政政策的成效,进而在当前正在快速推进的现代财税体制建设中为政府间垂直财政收支分配关系的顶层设计提供一些完善思路。本文其他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以及在垂直财政不对称作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是变量度量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实证估计、转移支付依赖的门槛效应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①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体现为政府间的税收收入、财政支出责任划分,而调整垂直财政关系的政治经济动因无疑是实现特定宏观战略、国家治理的目标。曹正汉和周杰(2013)提出经济效率和社会风险两个原则主导着中国公共品供给中政府间集权与分权的垂直关系。鲁建坤和李永友(2018)也提出为了更好地回应居民对政府治理、政府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等多方面需求的不断变化,中央的财政收入集权可以更好地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当前国家治理需要回应的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有必要研究财政分配体制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特征。

(一)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

垂直财政不对称体现的是财政集权、分权制度安排,而关于政府间财政分权的收入分配效应,目前在理论上的看法并不一致。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越高,就越能够根据辖区居民偏好信息履行公共支出责任,总体上这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Musgrave 和 Shoup, 1959)。但 Beramendi (2003)则认为财政分权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理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越大,地方财政越容易出现行为扭曲和行政效率低下;陶然和刘明兴(2007)认为现行 GDP 和税收收入的垂直考核体系会使地方政府更偏好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城市地区,因而财政分权度越高,就越会加剧城乡收入分配不公。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中,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往往存在非对称性(Shah, 2004)。中国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税收收入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并存总体上提高了我国垂直财政不对称程度,中央政府将事权层层下移,赋予地方经济发展、民生建设等多方面支出责任。地方政府在政治需求利益和财政利益驱使下从“援助之手”演变为“攫取之手”,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出现恶化(陈抗、顾清扬, 2002)。龚锋和卢洪友(2009)基于中国长期实施的户籍制度约束,以及“用脚投票”公共选择机制的双向缺失,认为垂直财政不对称会使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于基础设施,因而削弱了居民收入再分配调节的成效。Bahl 和 Wallace (2010)则强调财政分权的经济效应主要取决于对地方政府财政经济行为的激励作用,如果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地方政府能够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增加教育、卫生支出,则会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如果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引起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将财政财力更多地投向城市经济部门而忽视社会福利性、再分配性财政支出,则会恶化以城乡为代表的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周黎安, 2007)。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围绕的主要是中央与省的财政收入分配关系,对支出责任划分只做了一些原则性安排。财政竞争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往往更加关注投资性支出,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降低企业和厂商的流通成本,吸引资本流入和带来即期 GDP 增长,这使地方政府具有显著的建设性支出偏好(付文林、沈坤荣, 2012)。伴随垂直财政不对称的加深,财政紧张的地区会更加偏向于保全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而越贫困的农村地区就越得不到财政资金的支持,自我发展能力也就越低下,因而区域间、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雷根强等, 2015)。

假说 1:垂直财政不对称的收入分配效应与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成效有关,通常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下会降低收入再分配力度,从而会加剧居民收入不平等。

(二)转移支付与收入不平等

政府间垂直财政不对称变化总是伴随着地区间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关系的调整。发展中国家的垂直财政不对称体制下,中央政府通过税收权力集中、支出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支出越来越依

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Brueckner,2009)。Shah(2004)通过跨国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平均有42%的收入来自转移支付,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占比更高,财政支出决策和税收收入的自由裁量权之间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

转移支付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地区间基本财政能力均等化,使每个地区的居民都能够享有相同水平的教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消除政府间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对资源配置所带来的负外部性(Oates,1999)。如果地方政府财力改善后,能够通过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渠道,直接或者间接将资金转移到低收入人群手中,则会降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程度(Hepp和Hagen,2010)。尤其是针对性的转移支付减贫制度,通过向特定救助对象提供社会财政援助,能够直接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有助于缩小区域间以及城乡间的贫富差距(Darity和Myers,1987)。

同时,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激励效应,这种激励效应既有矫正型激励,也有逆向激励。规范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地方经济性支出的边际收益,提高地方社会治理绩效(Bucovetsky和Smart,2006)。Weingast(2009)也认为,适当的转移支付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增加社会民生性支出,提高居民整体福利。而民生性支出,尤其是偏向于农村居民的财政支出对增加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缓解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王娟、张克中,2012)。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持续扩大,以实现均衡地区和城乡发展的目标。但是政府资金更加偏向于城市地区的投资,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致使农村地区发展缺乏动力,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陈钊、陆铭,2008)。

我国纵向转移支付是在地区间竞争的环境下运行的(周业安,2009),地方政府需要深入考量地区竞争转移支付的财政收入和流出效应,因而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和公共支出行为都可能产生影响(Buttner,1999)。经济欠发达地区可能更倾向于投资经济性公共品,因为民生性支出缺口更容易获得上级的转移支付补助;经济发达地区则更看重社会治理成效,从而更重视对社会性公共品的投入。地方政府投资的这种偏好不仅与地区资本规模相关,而且与地方政府支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度有关(李永友、张子楠,2017),即转移支付依赖度不同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差异,这会表现为对居民收入分配的非线性关系。

假说2:转移支付依赖度较低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而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且超过某阈值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现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①随着中央政府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财力不断上升,转移支付结构也不断发生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地方总财力的比重从1995年的5.93%提高到2015年的20.46%,专项转移支付占地方总财力的比重变化幅度较小,大体处于15%至20%之间。^②

一般性转移支付作为“无条件转移支付”,通常采用“因素法”对资金进行分配,以实现均衡地区财力为目标。^③均衡性转移支付作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主要内容之一,严格按照影响地区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进行分配。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和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

① 税收返还是对地方既得利益的返还,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资料来源: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zhuanjihuihu/czjbqk1/jbqk2/201405/t20140504_1074655.htm。

② 地方总财力=地方本级财政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地方上缴收入。资料来源:1996—2016年《中国财政年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和中经网相关统计数据。

③ 2017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包含的项目涉及均衡性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老少边穷地区转移支付、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等共计11项。

移支付等福利性转移支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具有重要地位。2017年,这三项转移支付总计5430.04亿元,占除均衡性转移支付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高达42.54%,其中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总额为5858.8亿元,位居第二,仅次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方法和显著的民生倾向^①,使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均衡地区财力、转移支付再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曾军平,2000)。

专项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为完成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任务,由接受专项转移支付的政府按照中央规定用途安排使用。属于中央和地方共担类的专项,如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需要中央和地方依据公益性和外部性等因素确定分担标准和比例。出于配套资金的限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反而缺乏内在激励去申请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并且上级政府在追求资金使用效率的驱动下,倾向于将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拨付给发达地区,这种恶性循环致使转移支付资金在改善居民收入再分配中的功能大幅缩水(贾颖,2015)。专项转移支付因为在审批、管理和绩效考核环节都缺乏明晰的指导方案,项目繁多,安排交叉重叠现象突出,真实、个性化的地方需求常常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同时,专项转移支付本身的制度缺陷为专项转移支付配置的政治关联性创造了漏洞。卢洪友等(2011)、范子英和李欣(2014)的研究都表明政治关联增强了专项转移支付在地区配置中的话语权。

因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直接挂钩,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相应会获得较大数额的补助,有利于地方政府提升对城乡收入悬殊等见效比较慢的公共支出的关注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因为有明确的资金用途,能够增加地方公共服务和物品的供给,但各级政府为了体现项目绩效,导致地方决策偏离居民的实际需要,弱化了专项转移支付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分配方面的效果。

假说3: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模式和政策目标不同,因而在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中,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可能存在结构性差异。

三、变量度量与数据说明

(一)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包括城乡之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地区行业之间等多个方面,其中城乡之间收入不平等最为显著(李实、赵人伟,1999)。有鉴于城乡收入不平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作为被解释变量,从实证层面进一步量化分析“部分分权”体制在社会公平和再分配中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全面测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本文主要借鉴田卫民(2012)、Sundrum(1990)的方法,通过计算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直接测度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关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和农村收入数据,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1987年以后按收入分为非等分的7组,农村居民纯收入在2001年以后按收入分为等分的5组,所以无论是按等分还是按非等分分组的计算公式都无法得到统一口径的基尼系数。本文通过衡量洛伦兹曲线中非平等面积与完全不平等面积的比值,推导出计算基尼系数的公式:

$$G = 1 - \frac{1}{ZP} \sum_{i=1}^n (Z_{i-1} + Z_i) p_i \quad (1)$$

^① 资料来源:《财政部关于印发2017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办法的通知》(财预[2017]51号)。均衡性转移支付设有具体的分配公式:均衡性转移支付总额=(地区标准财政支出-地区标准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系数+增幅控制调整+奖励资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补资金。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还参考了地方财政困难程度因素,主要根据地方“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支出占地方标准财政收入的比重和缺口率确定。采用“因素法”测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能够科学合理地“查缺补漏”,极大地提高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在财政支出,尤其是在民生领域支出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其中, P 是总人口, p_i 是第 i 组的人数, Z 是居民总收入, Z_i 是累计到 i 组的收入。式(1)很好地避开了等分和非等分的难题,只按照整体居民的收入进行分组,若已知按收入分组的每组的人数和收入,就可据此计算出基尼系数。

本文先依据式(1)分别计算出各省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 G_c 和 G_r ,然后采用 Sundrum(1990)提出的分组加权法,^①计算公式如下:

$$G = P_c^2 \frac{r_c}{r} G_c + P_r^2 \frac{r_r}{r} G_r + P_c P_r \frac{r_c - r_r}{r} \quad (2)$$

其中, P_c 、 P_r 分别是城镇人口和农村居民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 r_c 、 r_r 分别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r 是各省份的人均收入。因吉林、山东、海南和西藏等省份居民收入基础数据的缺失,我们仅测算出北京、安徽、浙江和上海等 27 个省份 1995—2015 年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gini$)。

(二)核心解释变量

1. 垂直财政不对称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前,我国中央财政面临很大压力,严重限制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职能履行。^② 分税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提高“财政两个比重”,尤其是要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地方政府因为“上缴”了更多的税收权力,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之间的不对称性也愈加显著。本文借鉴 Sharma(2012)提出的垂直财政不对称(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VFA)概念,通过衡量地方政府被分配超过自身收入的支出义务,计算支出分权和收入分权之间的差值,用以衡量垂直财政不对称的程度。Sharma(2012)认为收入-支出不对称具有天然属性,即客观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差距,转移支付作为不对称的补缺策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本文在引入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③的基础上,计算两者差值,用以衡量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的非对称性,将垂直财政不对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式(5)计算我国 27 个省份 1995—2015 年的垂直财政不对称程度。

$$FQre_{it} = \frac{\text{各省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text{各省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 + \text{预算内人均中央财政收入}} \quad (3)$$

$$FQex_{it} = \frac{\text{各省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text{各省份预算内人均财政支出} + \text{预算内人均中央财政支出}} \quad (4)$$

$$VFA_{it} = FQex_{it} - FQre_{it} \quad (5)$$

2. 转移支付相关变量

转移支付是垂直财政非对称的矫正性制度,主要是为了均衡地区间财政能力,通过对地方内生增长能力的激发和培养,发挥协调区域发展的作用,其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落后地区的发展潜力和积极性。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实现公平分配等宏

① 分组加权法实际上是一种用分解法计算基尼系数的方式,是在已有部分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求解出总的基尼系数。为了节约篇幅,这里省略了具体的推导,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阅。

② 分税制改革之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较低且这一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1992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28.1%,地方政府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71.9%;1993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22%,地方政府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为 78%。实施分税制改革后,1994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体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55.7%,高于地方政府收入所占比重 44.3%。

③ 各省份预算内人均财政收入(支出) = 各省份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各省份人口数,预算内人均中央财政收入(支出) = 预算内中央财政收入(支出)/全国人口数。

观调控目标。本文借鉴储德银等(2017)的做法,定义转移支付依赖^①(*trans*)如下:

$$\text{转移支付依赖} = \frac{\text{中央净转移支付资金}}{\text{各省份预算内财政收入} + \text{中央净转移支付资金}} \quad (6)$$

为了验证假说 3 中的转移支付结构效应,实证部分还使用了各省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gentrans*)、专项转移支付(*sptrans*)等人均数据。本文利用 1995 年为基期的省级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人均一般性转移支付、人均专项转移支付进行价格平减,并取自然对数。

(三)控制变量

本文的实证模型中引入了其他一些可能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lngdp*)、对外开放度(*open*)、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财政支出结构(*peop*)、城镇化率(*urban*)。(1)经济发展水平(*lngdp*),以 1995 年为基期对省级人均 GDP 进行价格平减,再对实际人均 GDP 取对数以增强数据平稳性;(2)对外开放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省级 GDP 的比重来衡量;(3)人均受教育年限(*educ*),即总人口受教育年限之和的平均数;(4)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用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数/(年末城镇从业人员数+年末实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来表示;(5)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用金融机构年末存贷款总额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6)财政支出结构(*peop*),用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②来表示;(7)城镇化率(*urban*),用各省份每年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本文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年鉴》(1996—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6 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96—2016 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1996—2016 年)和中经网等统计数据。同时,由于部分省份原始数据缺失,只采用了北京、上海和安徽等 27 个省份的样本,具体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等数据特征见表 1。

表 1 变量统计特征

变量	变量说明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N
<i>gini</i>	基尼系数	0.3826	0.0596	0.2275	0.5096	27 × 21
<i>VFA</i>	垂直财政不对称	0.2960	0.1124	0.0501	0.8489	27 × 21
<i>trans</i>	转移支付依赖	0.4933	0.1784	0.0491	0.8517	27 × 21
<i>gentrans</i>	一般性转移支付	5.2574	1.8982	0.1135	9.0130	27 × 21
<i>sptrans</i>	专项转移支付	5.5859	1.4517	1.9215	8.9813	27 × 21
<i>lngdp</i>	经济发展水平	9.3681	0.8075	7.5099	11.3091	27 × 21
<i>open</i>	对外开放度	0.3155	0.4117	0.0316	2.0513	27 × 21
<i>educ</i>	人均受教育年限	8.0281	1.1987	4.6926	12.1464	27 × 21
<i>unem</i>	城镇登记失业率	3.4514	0.8513	0.4600	6.8000	27 × 21
<i>finance</i>	金融发展水平	2.4328	0.9630	0.3584	7.5746	27 × 21
<i>peop</i>	财政支出结构	0.3795	0.1395	0.0133	0.6938	27 × 21
<i>urban</i>	城镇化率	0.4640	0.1604	0.2039	0.8960	27 × 21

① 中央净转移支付资金 =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总额 - 地方上解资金总额。

② 我国政府收支分类在 2006 年实行改革,本文对民生性支出的计算口径在 2007 年前后略有差异,但数据总体波动较小且满足平稳性要求。其中,地方政府民生性支出在 2007 年以前包含文化广播事业费、科学事业费、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费、卫生经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2007 年及以后则主要由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等组成。

四、实证检验

(一) 垂直财政不对称和收入不平等

根据假说 1, 垂直财政不对称会引起地方财政收支行为改变, 影响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在政治需求利益和财政利益驱使下从“援助之手”演变为“攫取之手”, 进而影响资源效率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商业传统、发展基础等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方法 (LSDV) 对全样本和分区域进行实证检验。^① 基准计量模型为式 (7), 其中 X 由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城镇化率、人均受教育年限、城镇登记失业率、财政支出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构成。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 也为了得出更加稳健的结论, 实证分析中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对原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 2。

$$gini_{it} = \theta_{i0} + \theta_1 VFA_{it} + \theta_2 VFA_{it}^2 + \theta X + u_{it} \quad (7)$$

$$gini_{it} = \theta_j \sum_{j=1}^p gini_{it-j} + \theta_1 VFA_{it} + \theta_2 VFA_{it}^2 + \theta X + \theta_{it} \quad (8)$$

表 2 全样本和分区域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

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4)	中部地区 (5)	西部地区 (6)
	LSDV (1)	Diff-GMM (2)	Sys-GMM (3)			
$gini_{it-1}$	—	0.7434*** (0.0628)	0.8675*** (0.0389)	—	—	—
VFA	0.5740*** (0.0814)	0.3550** (0.1704)	0.0931*** (0.0045)	-0.6240*** (0.1739)	-0.6302** (0.2740)	0.1693*** (0.0181)
VFA^2	-0.0621 (0.0894)	0.1400 (0.3432)	-0.0868 (0.1328)	-0.0316 (0.2691)	0.4564 (0.6805)	-0.0327 (0.1353)
$lngdp$	-0.0193*** (0.0070)	0.0561*** (0.0151)	0.0344*** (0.0128)	-0.0761*** (0.0152)	-0.1075*** (0.0208)	-0.0212 (0.0166)
$open$	0.0351*** (0.0074)	0.0095 (0.0063)	-0.0103 (0.0104)	0.0399*** (0.0072)	-0.1805** (0.0811)	-0.0389 (0.0272)
$urban$	-0.0084 (0.0256)	-0.3643*** (0.1233)	-0.2304** (0.1000)	0.2016*** (0.0342)	0.0574 (0.0469)	0.1250* (0.0720)
$educ$	-0.0151*** (0.0029)	0.0086** (0.0041)	0.0045*** (0.0017)	-0.0379*** (0.0049)	0.0231*** (0.0061)	0.0106*** (0.0036)
$unem$	0.0009 (0.0021)	0.0114*** (0.0037)	0.0074*** (0.0024)	-0.0029 (0.0026)	0.0272*** (0.0038)	-0.0059 (0.0044)
$peop$	-0.0363 (0.0405)	0.0244*** (0.0065)	0.0120** (0.0061)	-0.0612 (0.0658)	0.3204*** (0.0563)	0.1421*** (0.0497)
$financ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75** (0.0032)	0.0000 (0.0000)	0.0195*** (0.0040)
N	567	513	540	189	147	231

① 本文参照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划分标准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 9 个省份,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7 个省份,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11 个省份。

续表 2

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4)	中部地区 (5)	西部地区 (6)
	LSDV (1)	Diff-GMM (2)	Sys-GMM (3)			
<i>N</i>	567	513	540	189	147	231
调整后的 R^2	0.7119	—	—	0.8396	0.7557	0.6231
AR(1)	—	0.0002	0.0001	—	—	—
AR(2)	—	0.2235	0.2720	—	—	—
Sargan 检验	—	0.967	0.9821	—	—	—

注:(1)*、**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中数据为t统计量;(2)Sargan 检验一栏为过度识别的检验值,AR(1)、AR(2)分别表示一阶和二阶差分残差序列的 Arellano-Bond 自相关检验。

由于地区收入不平等可能存在路径依赖和递延效应,我们在扩展的计量模型(8)中加入了被解释变量(基尼系数)滞后一期值。另外,解释变量中包括的垂直财政不对称、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出结构与基尼系数可能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为了处理这些问题,本文在估计方程(8)时采用处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的 GMM 方法,两种估计的 Sargan 检验的 P 值均在 0.9 以上,表明工具变量整体有效。

全样本的 LSDV 估计实证结果显示,垂直财政不对称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随着垂直财政不对称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不平等呈现单调递增的动态特征。GMM 估计提供了一致性稳健结论。对比分区域的回归可以发现,垂直财政不对称每提高 1%,东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将降低 0.6240%,中部地区会降低 0.6302%,而西部地区会随之上升 0.1693%。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本身的单调变化及其在分区域中的异质性关系,使得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如果将降低垂直财政不对称作为总体政策目标难免顾此失彼。虽然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初次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但是在纵向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后,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的比重接近 4/5(李永友、张子楠,2017),收入再分配过程需要更加重视转移支付的作用。

图 1 显示的是 1995—2015 年东、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及其占比变化趋势。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及其占比都远高于东部地区,2015 年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为 23502.85 亿元,占全国转移支付规模的比重高达 42.66%,远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23.10% 和 34.24%。转移支付已经实现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但是在西部地区以及全样本范围,垂直财政不对称依旧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转移支付规模在区域间的差异成为影响两者关系的重要因素。

(二)垂直财政不对称、转移支付依赖和收入不平等

1. 门槛值以及门限效应检验

根据假说 2,垂直不对称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并不涉及二者之间的作用路径。转移支付作为垂直财政不对称矫正型策略,是“部分分权”下分税制的配套政策,是影响垂直财政不对称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关键因素。本文借鉴 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效应回归模型,将门槛值作为未知变量,创建转移支付的分段函数,并对门槛值和门槛效应进行检验。转移支付依赖与收入不平等的门槛回归模型如下:

$$gini_{it} = \delta_0 + \beta_1 VFA_{it} I(trans_{it} < \gamma) + \beta_2 VFA_{it} I(\gamma \leq trans_{it}) + \delta_1 \ln gdp_{it} + \delta_2 open_{it} + \delta_3 urban_{it} + \delta_4 educ_{it} + \delta_5 unem_{it} + \delta_6 peop_{it} + \delta_7 finance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9)$$

其中, $i(i=1,2,\dots,N)$ 代表地区, $t(t=1,2,\dots,T)$ 代表时间, I 为示性函数, γ 为门限变量转移支付的门限值, u_i 为观测的特定个体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且满足 $E(\varepsilon_{it})=0, E(u_i \varepsilon_{it})=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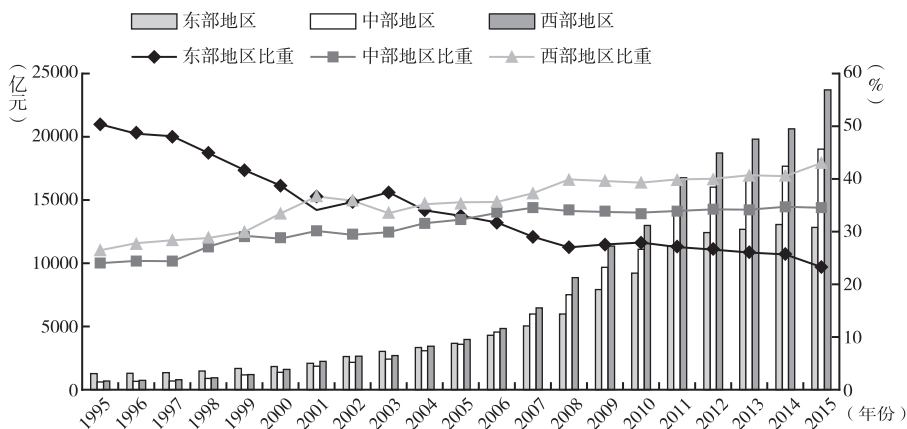


图1 1995—2015年东、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规模及其占比变化趋势

$E(\varepsilon_{it}\varepsilon_{is}) = 0 (\forall i, t, s, t \neq s)$ 。面板门槛模型首先利用组内去均值的方法,消除个体效应之后,再对任意给定的门槛值 γ ,通过估计式(9)估计相应参数估计值和残差平方和,最后用格栅搜索法(Grid Search)确定最小残差平方和以及对应的门槛值,表3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存在单一门槛值0.5231。

表3 门槛效应检验(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指数)

	F 值	P 值	10%	5%	1%	门槛值	置信区间
单一门槛	47.54 **	0.0433	39.5329	46.6273	64.9662	0.5231	0.5216 ~ 0.5240
双重门槛	14.45	0.4167	26.9037	32.0967	41.0794		

注:P值和临界值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反复抽样300次得到;**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

确定门槛值后再进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分为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与面板门槛真实性检验,均采用自抽样法,通过构建模型的渐进分布并得到似然比统计量(LR)。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以门槛值为临界点划分为两组样本,检验两组模型参数是否显著不同。零假设为模型不存在门槛效应 $H_0: \beta_1 = \beta_2$ 。通过构造F统计量对其进行检验,对采用自抽样法测试模拟出的门槛值进行判定。表3的结果显示,单一门槛效应检验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原假设,即 β_1 和 β_2 具有显著性差异,门槛效应明显;双重门槛效应检验接受了 $\beta_1 = \beta_2$ 的原假设,即双重门槛效应并不显著。极大似然估计量检验门槛估计值时发现,在95%的置信水平下,门槛值的置信区间为0.5216~0.5240,这一较小的区间范围证明模型估计的门槛值准确度较高。

2. 转移支付依赖对收入不平等非线性效应的实证分析

运用式(9)进行面板门槛模型的参数估计,面板门槛检验结果见表4,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具有显著非对称特征。当转移支付依赖小于0.5231时,位于区制1内,垂直财政不对称每提高1%,收入不平等将下降0.1462%。但当转移支付依赖大于等于0.5231时,进入区制2,收入不平等将上升0.1573%。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参照易先忠等(2014)的方法,对比了面板门槛估计结果与分组估计结果,分组估计依据转移支付依赖的25%、50%和75%的分位数,如表4右列所示。分组研究结论进一步表明,随着转移支付依赖的提高,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系数由负转正,且系数绝对值逐渐增大。当转移支付依赖小于等于0.3698以及处于0.3698~0.5322区间内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而当转移支付依赖处于0.5322~0.6123区间内以及大于0.6123时,垂直财政不对称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影响系数也由0.1505%上升到0.5626%。

表 4 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面板模型估计、分组估计)

(1) 门槛估计		(2) 分组	$trans \leq 0.3698$	$0.3698 < trans \leq 0.5322$	$0.5322 < trans \leq 0.6123$	$trans > 0.6123$
区制 1: VFA ($trans < \gamma$)	-0.1462 *** (0.0255)	VFA	-0.1861 * (0.0973)	-0.3084 *** (0.1100)	0.1505 ** (0.0733)	0.5626 *** (0.0878)
区制 2: VFA ($trans \geq \gamma$)	0.1573 *** (0.0371)		$lngdp$	0.0275 *** (0.0100)	-0.0041 (0.0168)	0.0402 *** (0.0097)
$open$	0.0112 (0.0081)	$open$	0.0428 *** (0.0098)	-0.0396 (0.0635)	-0.0249 (0.0987)	-0.0494 (0.0442)
$urban$	0.0997 ** (0.0438)	$urban$	-0.0846 ** (0.0414)	0.0265 (0.0797)	-0.3287 *** (0.0839)	-0.1810 ** (0.0734)
$educ$	0.0090 ** (0.0037)	$educ$	-0.0197 *** (0.0059)	0.0145 * (0.0084)	0.0215 *** (0.0069)	0.0159 *** (0.0045)
$unem$	0.0140 *** (0.0019)	$unem$	0.0048 (0.0034)	0.0076 (0.0050)	0.0195 *** (0.0049)	-0.0057 (0.0041)
$peop$	0.0115 (0.0125)	$peop$	0.0081 (0.0356)	0.0197 (0.0416)	0.0183 (0.0322)	0.0607 ** (0.0276)
$finance$	0.0000 * (0.0000)	$finance$	0.0027 (0.0039)	0.0000 (0.0000)	0.0252 *** (0.0058)	0.0257 *** (0.0059)
R^2	0.6022	R^2	0.7569	0.7571	0.6063	0.6265
N	567	N	174	146	132	115

注:括号内为系数估计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

为了进一步观察在转移支付门槛值两侧对收入分配的异质性影响,我们观测了1995年、2005年和2015年各省份在门槛区间内的分布情况(见表5)。各年度超过门槛值的省份以中西部地区为主,且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其中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6个省份的转移支付依赖一直高于0.5231的门槛值。这可能是因为地区禀赋差距过大,容易引起落后地区产生“等靠要”的思想(Cai和Treisman,2005),也可能是因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转移支付的减贫作用尚未达到预期效果。转移支付的减贫作用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转移支付引起的行为反应(Darity和Myers,1987)。Skoufias和DiMaro(2008)运用墨西哥PROGRESA项目经验数据的研究发现,国家层面大规模的转移支付之所以没有产生较好的减贫效果,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并没有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刘穷志(2010)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中农村住户数据进行研究,同样发现中国转移支付减贫拉大了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因为转移支付仅仅有效保障了农村贫困家庭的基本生存,^①转移支付激励减少了贫困家庭的劳动和投资,家庭收入反而减少。

① 2011—2015年,中央财政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累计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898亿元,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如2018年中央对地方新增教育转移支付达130亿元,主要倾斜于中西部困难地区和教育薄弱环节。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担上,中西部地区城乡教育的公用经费以及普通高中、中等性质的职业学校等的教育经费,中央和地方的分担比例为8:2,东部地区为6:4(资料来源于《人民日报》2018年5月27日)。公共卫生转移支付逐年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管理平台(<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qu/czqzyzfglbf/>)数据显示,2018年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预算达337.0423亿元,其中中西部地区预算分配指标总计284.0337亿元,占项目预算指标分配的比例为84.27%。

表 5 相关年份转移支付依赖门槛值区间划分

年份	转移支付依赖 (<0.5231)	转移支付依赖 (≥0.5231)
1995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	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005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辽宁、黑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2015	北京、天津、山西、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湖北、广东、海南、重庆	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三) 不同类型转移支付的门槛效应检验

根据假说 3, 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分配模式不同, 在转移支付中具有结构效应。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形式转移支付如何影响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不平等作用的方向, 参照式(9), 分别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作为门槛变量, 则有以下单门槛的基准方程, 具体门槛数量由门槛个数检验给出:

$$gini_{it} = \partial_0 + \beta_1 VFA_{it} I(gentrans_{it} < \gamma) + \beta_2 VFA_{it} I(\gamma \leq gentrans_{it}) + \partial_1 \ln gdp_{it} + \partial_2 open_{it} + \partial_3 urban_{it} + \partial_4 educ_{it} + \partial_5 unem_{it} + \partial_6 peop_{it} + \partial_7 finance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0)$$

$$gini_{it} = \partial_0 + \beta_1 VFA_{it} I(sptrans_{it} < \gamma) + \beta_2 VFA_{it} I(\gamma \leq sptrans_{it}) + \partial_1 \ln gdp_{it} + \partial_2 open_{it} + \partial_3 urban_{it} + \partial_4 educ_{it} + \partial_5 unem_{it} + \partial_6 peop_{it} + \partial_7 finance_{it} + 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1)$$

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均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见表 6)。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门槛值分别为 1.6997、2.2598, 专项转移支付的门槛值分别为 1.8325、2.8908。

表 6 门槛检验

门槛变量	门槛数	F 值	P 值	10%	5%	1%	门槛值	置信区间
一般性转移支付	单一	98.66***	0.0000	37.5463	44.9147	62.2594	1.6997	1.6940 ~ 1.7224
	双重	28.13**	0.0433	23.1526	25.9588	32.1187	2.2598	2.2308 ~ 2.2604
	三重	16.1100	0.7067	38.0705	41.1171	48.2993		
专项转移支付	单一	65.57***	0.0000	33.3285	36.4682	52.8567	1.8325	1.8265 ~ 1.8503
	双重	37.38**	0.0267	25.3332	29.1198	39.7393	2.8908	2.8702 ~ 2.9009
	三重	12.4800	0.2933	19.1266	24.2242	51.0477		

注: P 值和临界值采用自抽样法反复抽样 300 次得到; **、*** 分别表示在 5%、1% 的水平下显著。

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门槛估计结果见表 7。垂直财政不对称在不同区制内均会显著降低收入不平等, 当一般性转移支付处于 1.6997 ~ 2.2598 区间, 即位于区制 2 时, VFA 的缓释作用最强, VFA 每提高 1%, 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会随之降低 0.1430%。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按照公式法进行分配, 充分考虑了影响地区财政收支的成本因素、税收努力和财政困难度。在实施中以公正、规范为分配原则, 对于缩小地区财力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专项

转移支付的门槛估计结果显示,当专项转移支付小于 1.8325 时,垂直财政不对称与收入不平等呈负向相关,跨越 1.8325 的门槛值,进入区制 2 时,垂直财政不对称每增加 1%,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将上升 0.0945%,在区制 3 中,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将上升 0.1472%,整体呈现“U 型”的影响趋势。一定规模的专项转移支付可以很好地调和垂直财政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但专项转移支付一旦超过一定范围,其弊端将凸显并占据主导地位。目前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共计 100 余项,覆盖面过于宽泛,重点不够突出,难以体现并贯彻中央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引导和宏观调控。

表 7 门槛估计结果

自变量	门限变量	
	一般性转移支付 ($gentrans_{it}$)	专项转移支付 ($sptrans_{it}$)
区制 1: $VFA(trans_{it} < \gamma_1)$	-0.1100*** (0.0360)	-0.0754** (0.0331)
区制 2: $VFA(\gamma_1 \leq trans_{it} < \gamma_2)$	-0.1430*** (0.0402)	0.0945*** (0.024)
区制 3: $VFA(trans_{it} \geq \gamma_2)$	-0.0616** (0.0255)	0.1472*** (0.0256)

注:括号内为系数估计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 5%、1% 的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和建议

鉴于公平收入分配“一体多面”的重要性,并且和财政体制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基于“部分分权”的体制安排,阐述了垂直财政不对称、转移支付和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并在全面测量 1995—2015 年我国 27 个省份垂直财政不对称和转移支付依赖的基础上,以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再分配衡量标准研究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实证分析中,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利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估计方法回归得出结论: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显著降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全样本和西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反而会随之上升。转移支付规模和结构在地区间的异质性分布是影响垂直财政不对称和收入不平等关系的重要因素。转移支付依赖的面板门槛研究显示,转移支付依赖度较低的地区,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有效降低收入不平等;而超过一个阈值时,转移支付依赖度较高的地区,垂直财政不对称提高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同时,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模式不同,垂直财政不对称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转移支付不仅是垂直财政失衡的重要补缺策略,而且广泛作用于协调政府间利益关系之中。由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可能完全一致,故而在财税体制建设中,转移支付被赋予协调政府间矛盾和利益冲突、实现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重要目标。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在垂直财政不对称和收入分配中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转移支付依赖一旦失“度”,会通过总量和结构效应对地方政府产生行为激励,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作用。

本文的研究说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改革需要将转移支付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一方面,需要通过改变政府考核机制激励地方政府转变职能,激发地方政府对民生领域建设的积极性,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方面的投入,提高居民整体福利并且更加注重转移支付的“济贫”使命,提高对贫困人口及地区的关注度和补贴,缓解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建立并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在深化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基础上,明晰转移支付资金的范围和界限,提高转移支付制度的法治化水平。同时,还应不断优化转移支

付结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办法,客观引入反映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相关因素,使转移支付分配客观公正。

参考文献:

1. 安体富、蒋震:《影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若干产权制度问题研究》,《财贸经济》2012年第4期。
2. 曹正汉、周杰:《社会风险与地方分权——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地方分级管理的原因》,《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3. 陈抗、顾清扬:《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
4. 陈钊、陆铭:《从分割到融合:城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5. 储德银、韩一多、张景华:《中国式分权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基于预算内外双重维度的实证考察》,《财贸经济》2017年第2期。
6. 范子英、李欣:《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7. 付文林、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8. 龚锋、卢洪友:《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管理世界》2009年第1期。
9. 龚强、王俊、贾坤:《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研究:一个综述》,《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10. 贾颖:《专项转移支付改革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15。
11. 雷根强、黄晓虹、席鹏辉:《转移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我国中西部县域数据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财贸经济》2015年第12期。
12. 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
13. 李永友、张子楠:《转移支付提高了政府社会性公共品供给激励吗?》,《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14. 刘穷志:《转移支付激励与贫困减少——基于PSM技术的分析》,《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1期。
15. 鲁建坤、李永友:《超越财税问题: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国财政体制垂直不平衡》,《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16. 卢洪友、卢盛峰、陈思霞:《关系资本、制度环境与财政转移支付有效性——来自中国地市一级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
17. 吕炜、王伟同:《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基于政府偏好和政府效率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8. 陶然、刘明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政府开支及财政自主》,《世界经济文汇》2007年第2期。
19. 田卫民:《省域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测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经济科学》2012年第2期。
20. 王娟、张克中:《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012年第1期。
21. 易先忠、欧阳晓、傅晓岚:《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经济研究》2014年第6期。
22. 曾军平:《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财政平衡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23. 周业安:《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吗?》,《理论前沿》2009年第6期。
24.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25. Bahl, R., & Wallace, S., Public Financing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Public Budgeting & Finance*, Vol. 25, No. 4, 2010, pp. 83 – 98.
26. Beramendi, P.,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Case of Decentralization. Discussion Paper SP II 09, 2003.
27. Brueckner, J. K., Part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 Vol. 39, No. 1, 2009, pp. 23 – 32.
28. Bucovetsky, S., & Smart, M., The Efficiency Consequences of Local Revenue Equalization: Tax Competition and Tax Distor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Vol. 8, No. 1, 2006, pp. 119 – 144.
29. Buttner, T., Regional Stabilization by Fiscal Equalization?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Germany. ZEW Discussion Papers, No. 99 – 23, 1999.
30. Cai, H., & Treisman, D., 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s?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3, 2005, pp. 817 – 830.
31. Careaga, M., & Weingast, B. R., The Fiscal Pact with the Devil: A Positive Approach to Fiscal Federalism, Revenue Sharing, and Good Governance. Unpublished Paper, 2000.
32. Darity, W. A., & Myers, S. L., Do Transfer Payments Keep the Poor in Pov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7, No. 2,

1987, pp. 216 – 222.

33. Hansen, B. E. ,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 93, No. 2, 1999, pp. 345 – 368.

34. Hepp, R. , & Hagen, J. V. , Fiscal Federalism in Germany: Stabiliz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before and after Unification. CEPR Discussion Papers, Vol. 42, No. B01, 2010, pp. 51 – 74.

35. Huang, B. , & Chen, K. , Are 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in China Equalizing?.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23, No. 3, 2012, pp. 534 – 551.

36. Musgrave, R. A. , & Shoup, C. S. ,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s of Taxation, Readings in the Economics of Wa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p. 5147 – 5151.

37. Oates, W. E. , An Essay on Fiscal Feder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7, No. 3, 1999, pp. 1120 – 1149.

38. Sharma, C. K. , Beyond Gaps and Imbalances: Restructuring the Debate on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Rel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90, No. 1, 2012, pp. 99 – 128.

39. Shah, A. ,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Progress, Problems, and the Promise. The World Bank, 2004.

40. Skoufias, E. , & DiMaro, V. ,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 Adult Work Incentives, and Poverty.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4, No. 7, 2008, pp. 935 – 960.

41. Sundrum, R. M. , *Income Distribu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ondon: Routledge, 1990.

42. Weingast, B. R. , 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 The Implications of Fisc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Vol. 65, No. 3, 2009, pp. 279 – 293.

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and Income Inequality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Financial Transfer Payment Dependence

HAN Yiduo, FU Wenl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082)

Abstract: The inequality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at this stage.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vertical financial distribution system on the income gap since the tax sharing reform. The result is as follows: The increase of 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fails to narrow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n the whole. When the degree of transfer payment dependence is low, the increase of 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will reduce the income inequality of residents; but when the degree of transfer payment dependence exceeds a certain threshold, the increase of 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will aggravate the imbalance of resident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Under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 the increase of 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will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under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 the impact of 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on income inequality presents a “U-shaped” relationship. This means that in the reform of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allocation relations, we should control transfer payment on a certain scale and raise the proportion of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 in the future.

Keywords: Vertical Fiscal Asymmetry, Transfer Payment, Income Inequality, Panel Threshold

JEL: E62, H50, I38

责任编辑:非 同